

中国民间歌谣

□刘辟原

民间歌谣是中国民间文艺中的基础类别,是民众生存状态乃至心理情绪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在所有民间文学艺术中,歌谣是最活跃,也是最有传承和创新力的民间艺术形式。

歌谣也称民谣,它泛指在民间产生和流传的相对短小的韵文作品。歌谣的英文名字是folk-song,意味着民众所做的歌,也名为ballad,意为跳舞歌。我国古代语言是单字表意,歌与谣同时存在,有时通用,有时独立,《诗经·魏风·园有桃》中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因为一首诗中同时用了“歌”和“谣”两个概念,所以《毛传》中做了区别解释: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也明确表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按照《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的分类方案,歌谣与长诗、史诗、说唱并列,属于韵文中相对短小的作品,包括歌和谣两种呈现形式,贯通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具体来说,就是歌谣和民歌。《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歌谣卷》以民间文学范畴的歌谣为主,辅以各地著名民歌,使得本次出版的所有各地歌谣卷与以往的呈现显著不同,它歌谣一体,打破了长期以来文人建制的藩篱,还原了民间歌谣的完整性和统一性。

民间歌谣历史悠久,它伴随语言而生成,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存在,它是生产和生活的艺术描述和口头记录。所幸我国自古就有文字记录的传统,能够让我们窥见一斑。《尚书·虞书》记载:“吁,击石附石,百兽率舞”这是歌舞场面,最生动地诠释了“歌之舞之,足之蹈之”的场景。而最早的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的《弹歌》,更是中国民间歌谣的成熟的佳作。

即便是被定为文学经典的《诗经》,最为传诵的还是“十五国风”,其中关雎之喜、黍离之悲、七月之全面、氓之决然,无不令人击节沉醉,抚掌赞叹。而后,汉唐宋明,虽然文人作品占了史著主流,但只要政治有大事,社会有离乱,生活有波折,情绪有喜怒,歌谣都是最便捷的表达方式。江西的红歌,西部的情歌,内蒙的长调,吴越的山歌,仍然脍炙人口,甚至从田间走向了舞台。

晚清和近现代以来,民间歌谣得到重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从清末开始的歌谣研究走向了新的阶段。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专门开展了“歌谣是什么”的学理性讨论。在革命圣地延安,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开设了民间文学课程,鲁艺师生深入陕北农村采集民歌。经何其芳、张松如(公木)、毛星编辑整理,出版了首部《陕北民歌选》。当时鲁艺还专门成立了“民间音乐研究会”,著名音乐家吕骥、安波、马可、张鲁、刘炽等用时3年,收集到民歌2000余首。当时边区政府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特拨出2000元,奖励几年来积极采风的工作者。在此期间,对歌谣的研究也随之发展,先后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大家的文章,其中严辰的《从民谣看民心》、周扬的《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马可的《群众是怎样创作的》等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新中国建立之后,继承延安的优秀传统,国家对于民间文学给予高度重视,随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成立,先后开展多次采风,在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中,也专门为“民间歌谣”立卷,收集歌谣192万余首,包括全国56个民族、36省市和自治区。在2010年开始的“中国民间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工程”建设中,又有各地区补充的歌谣百万余首。但尽管如此,仍然不是全部,如果再加上《中国音乐集成》中的民歌,歌谣的数量就更加惊人。《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歌谣卷》从这些成果中优中选优,并补充新世纪搜集的作品,形成面貌一新、科学全面的民间文艺巨作。

按照传统的内部分类,同时兼顾艺术表现,分为以下6类:1.劳动歌谣。主要指按照劳动节奏、与劳动紧密结合、具有协调劳作动作、鼓舞劳作情绪的特殊功能的歌谣。包括指挥动作力度的各类号子、夯歌、伐木歌、薅草锣鼓等。同时也包括舒展情绪的采茶歌、脚夫调、爬山歌等等。2.生活歌谣。广义的生活歌谣可以包括大多数歌谣,这里指狭义的生活歌谣,主要指日常生活、个人体验的歌谣,包括妇女的苦情歌、自叹歌以及各种劳作身份、各种工匠的自述歌谣等等。3.爱情歌谣。专指男女爱恋和婚姻中的歌谣,是歌谣中最丰富最优美的类别。包括相识歌、试探歌、赞美歌、相思歌、热恋歌、离别歌、失恋歌、抗争歌、婚誓歌等等。4.时政歌谣。主要是与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相关的歌谣,包括表达讽刺、揭露、感叹、歌颂、怀念等涉及政治情感的歌谣,其中的红色歌谣最有特色,从《两条半枪闹革命》到《送郎当红军》,从《建立红色根据地》到《东方红》,红色歌谣是铿锵有力的号角和战鼓,是党政军民团结的颂歌。5.仪式歌谣。仪式歌谣又称礼仪歌,主要指在祭祀天地祖先神灵、纪念烈士、乞祥纳福、婚丧嫁娶等具有庄严感和固定程式化的仪式上所演唱的歌谣。包括祭祀的颂歌、祈求农事丰产的田歌、驱邪灭灾的口诀谣、丧事中的开路谣、婚事中的哭嫁歌、祝福歌、宴席上的祝酒歌等。6.儿童歌谣。主要是传统的短小的童谣,包括摇篮曲、数数歌、问答歌、游戏歌、绕口令、顺口令、时序歌、颠倒歌等。当前由于各种幼儿教育的兴起,创作的童谣增多,本卷以未曾署名和几代人流传为标准。

总而言之,民间歌谣是民间生活的艺术记录和形象载体,是志外之志,史外之史。《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歌谣卷》是我国各民族语言的诗话,它朴素而华美、昂扬而真情,它天然地融汇了民族的精神、社会的历史、阶层的状态和审美情趣。它是语言的艺术,音乐的艺术,更是心灵的艺术,情感的艺术。我们今天编纂《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歌谣卷》,是对各民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歌谣精华的总结,是发扬中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范本,它的出版将为美丽的中国梦增添光彩,为文化自信提供实实在在的认知范本和精神营养。

以高度的历史担当重视歌谣卷编纂工作。2018年7月,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出版工程江西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江西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和工作办公室成立。省文联党组书记郑翔任领导小组组长,2018年7月31日,江西省文联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出版工程江西卷工作的通知》,同时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歌谣·江西卷》专家委员会与江西歌谣卷编委会,2018年8月28日,在南昌召开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形式,即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部分。江西古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资源丰富,历史厚重,承东启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为独具特色的江西民间歌谣提供了丰厚土壤。江西歌谣绝大多数是以反映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习俗、礼仪和农村青年男女爱情为内容,农耕文化特色浓。吴头楚尾,吴文化和楚文化都对江西地区有影响,江西的民间歌谣也受到吴歌、西曲的影响。从历史角度看,随着中原文化南移,中原文化、语言、习俗,与当地文化、语言、习俗相融合,从而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客家山歌。

以高度的历史担当重视歌谣卷编纂工作。2018年7月,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出版工程江西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大系出版工程江西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和工作办公室成立。省文联党组书记郑翔任领导小组组长,省文联党组成员、主席叶青任领导小组副组长,2018年7月31日,江西省文联下发了《关于做好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出版工程江西卷工作的通知》,同时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歌谣·江西卷》专家委员会与江西歌谣卷编委会,2018年8月28日,在南昌召开

了“中国民间文学出版大系·江西卷”编纂工作推进会暨专题培训。大系出版工程江西省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西歌谣卷编委会编委及各设区市主要编纂人员40余人参加会议。叶青指出,组织实施大系出版工程江西卷是当前头等大事,要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要把该项工作列入当地文联的议事日程,争取得到更多的关心和支持,为编纂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保证工作顺利开展;要强化责任意识,加强人才培养和联络协调,确保高质量、高水平完成民间歌谣江西卷的编纂工作。

精心梳理江西各地丰富多彩的歌谣。2018年8月起,各设区市文联、民协承担此项工作,相继成立了歌谣编委会,并举办了培训班,任务落

新编歌谣卷:关注文学与音乐的共生样态

□赵塔里木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在搜集文本、编选作品的科学性原则中有“努力还原民间文学的实际状况。除了记录口述了什么,还需要尽可能描述民间文学演述的现场和情境,注重记录民间文学的演述行为、方式和过程”的表述。根据该原则,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歌谣卷专家组在编纂体例中要求,涉及演唱行为的民间歌谣,需完整记录其歌词、曲调以及表演行为,重点关注每种体裁中具有区域、民族特点的这类作品。歌谣卷在编纂体例中提出这一要求,旨在努力改变以往歌谣记录中音乐与诗歌分离的状况,力求客观、完整地还原这类歌谣的全貌,提升歌谣卷的文献价值,能够为深化歌谣研究提供新型资源。

从发生学角度看,具有演唱行为的民间歌谣是以曲调和韵文共生体的形态呈现,这是其本质属性。王小盾先生认为:“作为音乐文学的内容因素的文学的发展,受制于作为其形式因素的音乐的发展。任何一种韵文体制的建立,都是音乐形式更替的产物。民间文学代表了发生形态的文学,音乐性和表演性是它的基本特性。重视民间的文学创造同重视音乐对文学的制约作用,精神是一致的”。

从以上认识出发,描述此类歌谣应注意具体裁属性——发生和传播的特殊性,有助于加深对音乐与文学关系的理解。我们在田野工作中观察到民间歌手记忆唱词的一些重要手段。他们往往以“听”的方式习得依附于曲调的唱词,演唱时则需要借助于曲调再现唱词。我们认识到,在汉语歌谣的唱词(包括各种衬词)同曲调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条件下,曲调对于唱词就有了特殊语调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唱词原有的语调功能被曲调替代。对于讲汉语的歌手来说,如果将民歌的曲调剥离出去,留下的唱词则形同残缺的语言而无法再现。民歌的曲调和唱词,犹如皮和毛的关系,如果民歌丢失了音乐部分,它的唱词也难以被保存并传承至今。在此类歌谣唱词的各种衬字

中,很多具有结构意义,它们与正词结合在一起形成固定的唱词格式。如果把唱词同曲调分离开来,我们将无法辨认哪些是具有结构意义的衬字,更无法弄清唱词格式和曲调在节奏上的对应关系。

应该特别指出,以双重载体传承和传播的歌谣不是书写的文本形式,而是口头的。这一特征提示着音响材料在研究资料中的重要地位。记录此类歌谣不仅需在采集阶段要获取完整的音乐与语言材料,还需要对其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描述和整合,难点亦在于此。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口传性质以及语言和音乐合为一体的表演特征所决定的。

清代以前,反映歌谣流传情况的材料主要有散见于历代文献中的歌谣记录和历代文人辑录的民歌集。这些材料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被记录的歌谣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年代标记,反映着不同时期歌谣流传地的民众生活和民间语言。但缺少曲调记录成为这些文本的遗憾。因此,仅仅利用这些材料很难看清历代民间歌谣在语言和音乐上的整体面貌。

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的学术运动,在中国拉开了科学搜集和研究歌谣的序幕。当时的歌谣征集工作本着忠实记录的宗旨,提出“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等记录原则,从而基本保证了所征集的13000余首近世歌谣在语言方面的真实性。值得注意的是,歌谣征集工作依据现代民俗学提出的科学、完整记录歌谣的学术要求,对民歌音乐方面的记录给予了关注,要求寄稿人注意“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但这个要求未能在歌谣征集工作中得以实现,其结果是《歌谣周刊》刊登的绝大部分歌谣仅仅是“有音节者”的唱词部分。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发起成立民歌研究会,开创了音乐界搜集、

整理民歌的风气。当时音乐界搜集民歌的目的主要是为音乐创作的民族化寻找素材,因此忽略了对民歌中传统歌词的完整记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70年代末,文学界和音乐界基本上分别延续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民歌记录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民歌歌词为主或者曲调为主的记录。

1979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纂工作全面启动。历经40年,上万人参与搜集、整理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了由县卷、地州市卷、省区直辖市卷构成的海量民歌数据库,大部分卷本正式出版。作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标志性成果,《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基本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民歌流传状况。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工作展开的同时,强调了完整记录音乐和唱词,少数民族语言唱词标注国际音标等要求。但在当时基层采集、整理工作的队伍专业构成、工作条件等限制下,很难全面达到上述要求,各地卷本在记录、整理的全面性方面略有参差。对于新编歌谣卷来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音乐描写方面仍有大量经验可资借鉴。

需进一步强调的具体方法有几点:1.客观记录“这一次”发生的音乐演唱表演,不根据记录者已有的音乐经验做调整,强调当次采集的真实性;2.覆盖面涉及每种体裁在不同区域、民族的代表性曲目,优先选择传承人的演唱曲目,从而构建出歌谣音乐地图;3.记谱中详略取舍,应清楚用记谱方式备忘什么。歌谣的音乐由多种要素构成,包括曲体结构、句法、调式、音阶、骨干音、典型进行、旋律线、装饰音、节奏型、速度等。无论采用速写式的粗线条记谱,或用素描式的细密记谱,尽可能描述出某个曲调最具特点的音樂要素表现方式;4.特别注意唱词和曲调的同构关系。少数民族语言唱词翻译应遵循原唱词的基本格律。

中国民间新编歌谣卷必将留下诗歌和音乐共生的历史。

民歌分类:容易出现的交叉和重复

□黄红军

歌谣,包括民间礼俗歌和祀典仪式歌等。有人根据仪式应用的情况把这类歌谣又分为诀术歌、节令歌、礼俗歌和祀典歌四种。其中诀术歌、祀典歌特征明显,不容易交叉重复。容易出错的在节令歌和礼俗歌。节令歌本是对某种节日或对时令描述的歌,像春节要牛儿灯时唱的《春牛歌》,其主要内容是歌唱农事生产、人畜太平,不注意给归到劳动歌里去了。唱时令的《十二月采茶》则容易归到生活歌里。最容易交叉重复的是礼俗歌中的婚嫁歌,像《不知他是啥心肠》《豌豆尖儿嫩苔苔》,还有数量众多的哭嫁歌,很容易与生活歌、爱情歌交叉重复。

第三,时政歌容易与生活歌交叉重复。准确地说,时政歌中谣的比例要远远大于歌,是一种反映和针砭世事的歌谣。时政歌大多短小犀利,爱憎分明,句数和字数都比较自由,没有固定的格式。除了讽刺和针砭时弊外,时政歌也有歌颂和表扬的,像解放后和改革开放初期,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欣喜若狂,改革开放的政策深入人心,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成就了时政歌谣的主流。时政歌谣中容易与生活歌交叉重复的是,反映生活艰辛困苦的歌谣与生活歌中的世态歌,如《眼泪打湿路》《苦日子何时能过去》《天上星星绿悠悠》《过路客人莫笑话》等等,分类时需仔细斟酌。还有《抓壮丁歌》,生活歌、时政歌中都有,我们最终把这类歌谣归到了时政歌谣中。

第四,生活歌容易与时政歌、爱情歌交叉重复。生活歌是个大概念,即使把劳动歌谣、仪式歌谣、时政歌谣、爱情歌谣从大概念的生活歌谣中单列出来,只取到洗衣的么妹儿等可能在拉抬的号子中加进慕情、探情的元素。像《妹儿就爱喊号子》《一朵映山红》《十二月采茶》之类的歌谣,如果没有明显的“标签”,不细看内容,很难把它归入劳动歌、爱情歌、生活歌中的哪一类。

第二,仪式歌容易与生活歌、爱情歌交叉重复。仪式歌,顾名思义就是在各种仪式上唱诵的

解等问题,给全省编纂工作带来诸多不便,笔者与省民协主席李小军一道,通过多方联系,让相关地市补充了一些重要资料,使得文本体例上相对完善,内容更加鲜活。

气贯长虹的江西歌谣具有独特价值。“唱戏一半假,山歌句句真”,真是江西民间歌谣的一大特色。这既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和客观反映,也是人民心声的真实写照。山歌《农民苦》《农民怨》《穷人身上一两把刀》和《长工歌》等都真实反映了解放前农民的苦难。真实还体现在爱情歌谣表达出的情真意切。在情歌中,青年男女用山歌互吐爱慕真情,如南康山歌《标致老妹双打双》《恋妹莫要存假意》《两人黄花对黄花》;南昌山歌《荷花爱藕藕爱莲》;瑞昌山歌《姐妹相爱一条心》;永新山歌《撩开桐叶看桐花》等。大量的情歌散发着诱人的山花之香,传递着淳朴、诚挚、善良、美好的真情。

由于不少江西歌谣将“仁、义、礼、智、信”和人伦之爱的基本内涵表达得淋漓尽致,有专家把江西歌谣比作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库。如赣南的《怀胎歌》是献给母亲的歌,歌颂母亲的伟大、母亲的挚爱、母亲的无

谣》,都很容易与时政歌谣交叉重复;“妇女苦歌”和“劝戒歌”“诙谐歌”中的一些歌谣,容易和爱情歌谣中的“送别歌”“苦情歌”“抗婚歌”交叉重复,需要认真梳理。

第五,爱情歌谣最容易与生活歌谣、仪式歌谣交叉重复。爱情歌谣是民间歌谣中数量最多,也最脍炙人口的一种,在历代民歌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四川民歌中的爱情歌谣丰富多彩,从试探、羡慕、相思到山盟海誓的热恋、相爱,再到缠绵难舍的离别、思念,甚至婚姻不成的苦情,可以说男女爱情的整个过程,在爱情歌谣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爱情歌谣主题明确,但它仍然是人间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像生活歌谣里的《丈夫人小无靠头》《十二月望郎》《四季歌》就容易归到爱情歌谣里去,而像《豌豆开花红又红》《盼郎归》《来世与郎打冤家》等也容易归到生活歌谣中去。至于与仪式歌谣交叉重复,是因为仪式歌中有很大一部分婚礼歌,它们的内容有的与情歌类似或雷同,须注意鉴别。

第六,儿童歌谣交叉重复最少。儿童歌谣是以简洁生动的韵语创作并流传于儿童中的一种口语歌谣。分析它在大类上之所以较少交叉重复的原因,一是它以特定的人群——儿童为对象,在内容形式上,无论是催眠歌、自然事物歌、童趣歌、事理歌、游戏歌、数字歌,还是绕口令、颠倒歌,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二是语言应用上,儿童歌谣语言形象逼真,极富童趣,较好分辨。

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分类都是相对的,以目前推荐的六类划分法来看,说是根据内容来划分,但儿童歌谣明显是以人群来划分的;劳动歌和仪式歌是以演唱场合兼观念唱内容来划分的;时政歌谣、生活歌谣、爱情歌谣确实是以内容来划分的,但歌唱的内容在外延上存在交叉,这就让一些“标签”不是很明显的歌谣在归类时颇费周章。好在编纂体例并没有故步自封,作茧自缚,而是要求线索分明,顺理成章,唯其如此,才能科学分类,清楚了。

私,倡导人们热爱母亲。歌颂革命信仰的赣南歌谣《灯火不算亮》:“灯火不算亮,太阳照亮堂,爹娘虽然苦,不如共产党。”再如兴国山歌:“打铁唔怕火星烧,革命唔怕杀人刀,斩了头来还有颈,斩了颈来还有腰。就是全身都斩断,杀人墩上爬三爬,爬向敌人咬一口,冲天怒气很难消。”表达了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江西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深情热爱,在歌谣中比比皆是。

江西民间歌谣,以其丰富的滋养影响了一代代人,发挥着精神凝聚与集体认同的民俗功能,像山间、崖畔的杜鹃花,深情而浪漫,质朴而芬芳,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深以江西歌谣为代表的璀璨的优秀民间文化,为满足新时代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写好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西歌谣编纂浅谈

□廖小凤

实到具体人员。赣州、抚州、九江、吉安等地市编委们日夜奋战,在认真梳理“三套集成”和民间文艺家个人成果基础上,注意搜集有代表性的新歌谣,并附有对所涉风俗的简要介绍,对于典型性的歌谣和歌曲附加图片,对重要传承人附有小有传。先后荣获多项荣誉、年逾70岁的老民间文艺家陈留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编纂任务,他一边照顾病重的妻子,辛勤搜集整理了将近5万字的歌谣。赣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肖艳平主动承担了赣南代表性民歌的筛选和录入工作。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俊昆担任了赣州民间歌谣的初审工作。笔者受省民协委托担任本卷的执行主编,由于各地市提供的歌谣数量不均衡,有的地市存在分类不清,未标明歌谣所属地,未标明调查人和演唱者姓名,没有注